

揭开图书“挂名主编”灰色利益链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陈席元 叶含勇)“拿到正式出版的书以后,我才发现在版权页和扉页上,副主编加了好几位,一个都不认识。”“第一主编9000元、第二主编8000元、第三主编7000元”,花个万八千,就能买个大学教材主编当?中介公司告诉你,这个真的可以有。记者暗访发现,从内容代写、主编挂名、出版入库到代购代销,围绕图书“挂名主编”已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

“副主编加了好几位,一个都不认识”

近日,高校教师刘强西向记者爆料,若干年前他参与了某高校出版社的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XX导论》一书的编写,该书2009年出版,由刘强西的同事、资深教授张文彬担任主编。

“当时,张文彬教授召集我和另两位同事赵顺良和孙玉刚一起编写,大家分工,各写了3章左右,最后由张文彬来统稿。”刘强西老师回忆,当他拿到书稿时,意外发现副主编多了3个人,而且他并不认识。

记者辗转得到了这本2009年版的教材,在扉页背面看到了“编写委员会”名单,副主编一栏,除了刘强西和赵顺良,还有李佳顺、宋志国、王爱东。据刘强西指认,这几位不认识的“副主编”,正是李佳顺、宋志国、王爱东,而另一位参与编写的同事孙玉刚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编委会名单上。

记者细览发现,这本《XX导论》的“后记”由张文彬执笔,其中第三段详细介绍了参与写作的人员分工——第一章由张文彬、杜鹏祥(刘强西的学生)合作编写;第二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由赵顺良执笔;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九章由刘强西写成;第五章和第八章由张文彬、孙玉刚编写。最后统稿由大家共同修改完成。

那么,多出的3位副主编是从哪儿来的?刘强西说,从编写到出版,全过程没有人和他们打过招呼,但由于出版合同通常是五年一签,现在早已过了追溯有效期,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时隔几年,这事又被提起来了。据张文彬介绍,上述高校出版社的一位责任编辑再次联系他,表示想对旧版进行修订再版,而且还对他说:“我们还有一人想评职称,想加个名字。”

从12月6日开始,记者以某高校出版社编辑的名义,以教材再版需要修订为

由,与这几位“副主编”先后取得了联系,分别向其索求当年参与编写的教材底稿。结果,3名“副主编”中,王爱东没有说明自己和2009年版的《XX导论》有任何关联,他说:“太久远我都不记得了,我不太清楚这个,也不参与了。”而李佳顺和宋志国则明确表示参与了该教材的写作。

但当记者询问能否提供当年编写的底稿时,李佳顺表示:“时间比较长了,我也换过电脑了,只能给你一部分。说实在话,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编写,人比较多,你最好和出版社联系,他那边有完整的。”而宋志国则对记者说:“时间太久了,你留个邮箱,我找到再发给你。”

当记者想请李佳顺和宋志国确认当年分工撰写的部分都是哪些章节时,两人的回答都是“时间久了,都忘了。”随后,记者又致电当年出版这本教材的某高校出版社,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一本书要加个名字,编辑事前肯定会和作者沟通好,但像你说的这种多出了几个副主编,作者都不认识的情况,肯定是编辑有问题,他事前就没有和作者沟通好。”

教材“主编位”网上公开卖 最贵2万 最便宜5500元

“专著教材代写,为您职称评审保驾护航。正规出版,211高校出版社、国家部委直属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安全操作,教师医生可后付款。”在一个有1300多名成员的“图书编辑出版”QQ群里,类似广告循环发送。记者以急需评定职称为由,进群咨询了多名代理。

“您是同行?要什么方面、什么位置?拿大号(注:常用QQ号)加我谈,没有大号就打电话。”代理们一开始很警惕,反复要求记者“用大号”“打手机”“加微信”。

随后一名代理表明身份:“我们是天津某出版社的,和多家高校出版社有合作,每本专著的主编,前三位都可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到,也就是上CIP(图书在版编目)。”

这名代理说,副主编无法上CIP,“如果别人跟你说副主编可以上,你得先去查清楚才行。”其他几名代理也证实,对副主编的收费很便宜,但名字只会出现在书的前言。

几番沟通,记者收集到6名代理的“主编、副主编”报价。归纳来看,“第一主编”的价位从8000元至21000元不等,

“第二主编”价位6500元至17000元,“第三主编”价位5500元至7000元,副主编价位从1000元至3000元不等。

一名代理称,价位根据出版社的级别定,买家出多少钱就可以挂对应档次的出版社,他所代理的国内一家名校出版社,想当教材“第一主编”,收费在2万元以上。

“挂名主编”究竟如何操作

为了弄清“挂名主编”交易全过程,记者尝试在某QQ群联系了一名叫“袁编辑”的代理。“袁编辑”首先给了记者一串CIP号:2017289572,“《教育现代化与教育设备管理》,何某某著,CIP才下来不久,你查查这个。”

记者登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查到了“何某某著”的《教育现代化与教育设备管理》,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显示,这本书2017年11月由北京XX出版社出版,ISBN(国际标准书号)号为978-7-5402-4771-3。

接下来,“袁编辑”向记者展示了这本书的“作品签约合同”。在这份委托代理协议中,“著作权人(权利人)”是“吉林省XX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著作签约人(代理人)”即是“袁编辑”所在的XX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袁编辑”告诉记者,“权利人”这一栏可以写作者的名字,如果作者觉得不方便,也可以像何某某一样,委托给代理公司,由后者与他所在的中介公司签订合同。“袁编辑”表示:“我们合作过很多次,假不了。”

记者在上述合同里看到,“权利人”授予代理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代理上述作品的出版权”,而代理人则“有责任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帮助权利人争取各种签约机会,并将联系进度和意见及时反馈给权利人”。

该合同注明,代理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主编挂满后6月出版”,落款是“XXXXXX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盖有合同专用章。

一条龙帮你出专著、挂主编

记者暗访发现,代写、挂名、出版、代销,“挂名主编”已然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在一些网络交易平台,提供“挂名主编”服务的商家不少。一些卖家为了证明自己“靠谱”,还让买家“晒出”了图书实物照片,并留言“合作了很多次,有诚信!”等。

一名卖家说:“只要肯出钱,稿子不用你写,主编、副主编随你挑,你只需要动员学生、亲友在内的人脉资源,帮忙代销一定数量的图书就行。”

为确认“挂名”图书是否为正规出版物,记者根据网店“晒出”的书名、出版社和ISBN,前往国家图书馆,在书架上找到了对应的实体书。

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出版社出版图书后,应将样本送交国家图书馆。只要未特别标注“非正式出版物”,馆内藏书均默认是正规、合法的公开出版物。

“是正规书不奇怪,因为中介去出版社买的是真书号。”某高校出版社总编辑一语道破,“这其实就是买卖书号的升级版,出版社把书号卖给中介,由中介张罗后续经营事宜。”

关于这些图书的来源,一名代理称,公司有编辑团队撰写各类专著和教材,专供“挂名”出售。根据其提供的截图,仅商科类就有近百种教材可供“挂名”出版。此外,在他人编写的教材中附上第二、第三主编或多名副主编“搭顺风车”的现象也很常见。

署名权买卖违法 卡住“需求”很重要

“同样出本书,我们三五年,人家三五万。”一位高校教师说,拿钱买主编还能评职称,对踏实做学问的教师太不公平。

北京科名专利代理事务所合伙人郭杨表示,按照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不可转让,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挂名主编”是对著作权的一种非法转让行为。

多名中介代理人员表示,买家“挂名”主编、副主编,多数就是为了职称评定,因为现在一些单位仍然将担任专著或教材的主编、副主编等列为职称评审条件。

“按说这不该作为职称评审依据。”在多家出版社担任法律顾问的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小伟告诉记者,著作权法并没有主编、副主编的说法,“作者才是参加作品创作的人,而主编、副主编主要承担统稿和联系作者这类行政事务性工作,并非创造性劳动。”

出版行业人士呼吁,建议不再将主编、副主编、编委等作为评职称的条件。同时,出版社也应该坚决杜绝书号买卖,斩断署名权买卖利益链。

(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上接A01版)要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统筹规划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和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建设,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发展主战场,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完善大数据发展政策环境。要坚持数据开放、市场主导,以数据为纽带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培育造就一批大数据领军企业,打造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我们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要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系统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

习近平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要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平

台,综合分析风险因素,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防范能力。要加强政企合作、多方参与,加快公共服务领域数据集中和共享,推进同企业积累的社会数据进行平台对接,形成社会治理强大合力。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指出,要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数据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大有作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强化民生服务,弥补民生短板,推进教育、就业、社保、医药卫生、住房、交通等领域大数据普及应用,深度开发各类便民应用。要加强精准扶贫、生态环境领域的大数据运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助

力,为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助力。

习近平强调,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要加强政策、监管、法律的统筹协调,加快法规制度建设。要制定数据资源确权、开放、流通、交易相关制度,完善数据产权保护制度。要加大对技术专利、数字版权、数字内容产品及个人隐私等的保护力度,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社会稳定、国家安全。要加强国际数据治理政策储备和治理规则研究,提出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对大数据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使大数据在各项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